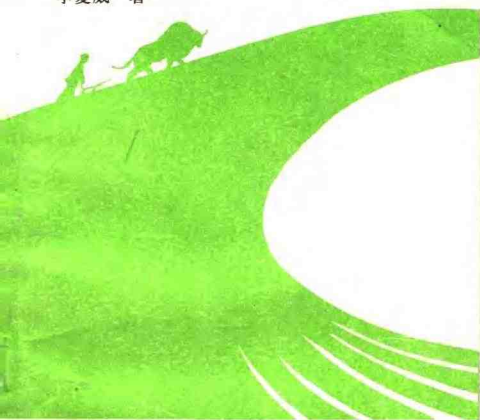


李复威 著



新时期小说的

嬗变与拓展

学苑出版社

新时期小说的嬗变与拓展

李复威 著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西四颁赏胡同4号

郭公庄古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¹/32 印张：7 字数：156千字 印刷：0001—41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60-272-9/G·168

定价：2.70元

前 记

德国作家歌德说过：“时代给予当时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十年或迟生十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外面的活动看来，便成为全然另一个人了”。

新时期小说，从它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算起，差不多已是整整十年的历程。从宏观上稍加探讨，我们可以发现，这十年小说的形象，与以往比较起来，已“成为全然另一个人”了。

应该说，敏锐地感应和及时地追踪它的优劣得失与演变趋向，是必要的，也是困难的。

有的文学思潮正在变衍之中；

有的艺术现象尚需进行沉淀；

有的创作正引起人们热烈的讨论和争鸣；

有的理论还处于萌芽状态……

这是文学在流动、探索、过渡的时代，这是小说个性在日趋成熟的时代，这是创作和研究的流派在逐步形成的时代，这是暂时“六神无主”而又在寻觅“权威”的时代，这是中国文学在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时代……无疑，需要探讨的课题太多了，需要总结的内容太丰富了，需要明确的结论太重要了，需要展望的前景太富有魅力了。

应该科学、开拓、变革、创造；

不能僵化、闭塞、偏见、武断……

如果把新时期文学的研究比喻为一条宽广的、曲折的道路的话，那么，这本为教学急需而草就的小册子不过是铺垫在路边的一粒小小的碎石。它是极不起眼的……

但是，我想：

它应该是真诚的；

它应该是易懂的——避开深奥的概念、生造的术语、晦涩的语言。

它暂时不涉及那些变幻不定的议题、正激烈辩论的现象，超前量过大的结论。

它，在很多问题上，仅仅是“一家言”——算不上“一家”的“一家”。

它，远远不是系统的，它是十分粗糙的，它是需要不断修正的。

一粒极不起眼的小小的垫路碎石，但愿在这一点上，它能是名符其实的……

李复威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录

前记

一 新时期小说的演变轨迹及趋向

引言	(1)
I、劫后文学的前前后后及小说的复苏	(4)
II、从“伤痕”到“反思”的激进姿态与轰动效应 ...	(11)
III、面对改革现实的呼唤和踌躇	(28)
IV、冠盖群芳的优异成果及独特贡献	(37)
V、在艺术十字路口的苦觅与求索	(58)
VI、多样化：从芜杂走向和谐	(67)
VII、在褒贬誉毁的评价天平上	(77)

二 新时期小说真善美的全面开拓

引言	(82)
I、小说观念的衍变	(84)
II、形象体系重心的调节	(92)
III、人物塑艺术演化的一个标志	(114)
IV、“人”的意识的发现	(124)
V、真实意识的开掘	(131)
VI、主题意识的解放	(138)
VII、文化意识的渗入	(145)
VIII、深层灵魂世界的揭示	(151)
IX、心理失态的哲学思辩与艺术表现	(158)
X、新潮小说美学分流的基本走向	(172)
XI、文体意识的自觉	(185)
附录:	
全国几项主要小说奖获奖作品篇目	(202)

一 新时期小说的演变轨迹及趋向

引 言

一九七六年十月，当粉碎“四人帮”的欢呼声、鞭炮声震撼中国大地的时候，历史又欣喜若狂地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跨入了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屈指算来，新时期文学已走过了近十二年的历程。虽然新时期文学仍在继续演进，对其发展前景也难以做出精确的预测，但是十二年的时限，已经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进程进行一些宏观的、规律性的研究了。这种探讨也许会受到种种局限，也许还不可能十分深入，然而从总结经验、提供信息的角度来说是必要的、有意义的。复杂的文学现象，经过长时间“沉淀”，泾渭分明，研究起来会较少失误。而在文学现象不断流动和变幻之中去探讨，也许会更具有引人的魅力。

如果不抱有任何偏见的话，人们都会承认，在众多的文学体裁中，新时期小说取得了最显著的成就、最大面积丰收和最引人注目的开拓。当然，同时也带来最大的歧见和最激烈的争鸣。小说创作，无疑是新时期文学潮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往往构成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标志。探讨它，不仅对小说的自身完善有推动作用，就是对整个新时期文学的总结、提高也是有价值的。

新时期小说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是第一阶段，也是小说创作在徘徊和犹豫中渐渐复苏的阶段。在

这短暂的两年时间里，由于政治思想领域内“左”的错误依然存在，拨乱反正的工作没有真正实施，文学创作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虽有少数优秀作品问世，但总体的创作面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三突出”、“主题先行”等错误的创作原则仍旧流毒甚广。小说的创作也相应地处于高昂的写作热情与低质的文学成果的矛盾情态之中。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一声春雷，宣告了“文艺的春天”的真正来临。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文艺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在新的文学潮流中短篇小说一马当先，奔腾在前，创立了不可磨灭的首功。中篇小说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成为文学的“造山运动”和“新时期文学之骄子”。这个时期小说的突出特点是走出了“瞒和骗”的泥淖，恢复和发展了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小说感应时代的脉搏，与新的社会运动同步前进，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紧密联系。小说真实感的加强和批判功能的高扬，使它在广大读者心中恢复了应有的崇高的地位。同时，小说创作突破种种禁区，广泛开拓，走探索和创新之路，开创出异彩熠熠的艺术新天地。这是新时期小说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小说创作真善美全面开拓的阶段。

直至一九八三年前后，小说创作的主潮方向出现了“全面散射”的态势。文学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化为对自身的疾迫、无情的挑战。小说观念的更新、审美方式的变革，成为许多作家孜孜追求的目标。文坛掀起了阵阵的“创新热”、“形式热”、“文体热”等。新颖的样式、奇异的手法、多样的个性、变幻的风格，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小说创作在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方面有较大的开展。这是一个多样选择、多元探索的阶段。作家们在寻觅、实验、追索……整个

小说创作处于艺术演进的十字路口。一直到今天，这个阶段仍在继续衍变中。这是一个向成熟过渡的阶段、一个酝酿着在更高层次上出现新的繁荣的阶段。

I、劫后文学的前前后后及小说的复苏

新时期小说同其它文学体裁一样，是在经历了长期“左”的思潮束缚后、经历了十年动乱的空前的文化浩劫后，挣扎着、欢呼着、焦虑着，开始了自己新的起点的。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那些“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揪心的日子里，祖国在受难，人民在垂泪，历史在呻吟。整个文苑是一派萧条、一片荒芜。多少受人们尊崇的作家受到批斗和禁锢，有的悲惨地告别了人世。图书馆被封禁，所谓“封、资、修”的书籍被焚毁。正如人们所形容的，万马齐喑、百花凋零。什么是文学？在广大群众心目中，文学似乎就等于那几部已经听得发腻的“样板戏”。一场空前的民族大劫难，一场空前的文化大劫难。当代文学（自然也包括小说创作）陷入了空前的沉默。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就在一些“御用”、“风派”文人无耻地制造着“瞒和骗”的文艺与“阴谋文艺”的同时，不少正直的作家已经用种种形式向这法西斯的文化专制表示了愤懑和抗议。有的以沉默表示反抗；有的在狱中进行秘密的写作构思；有的冒着极大的风险，创作着“地下刊物”、“手抄本”……人们熟悉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就是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作品。作者张扬是一个敢作敢为的热血青年。他在“四人帮”的高压之下艰难创作，六易其稿，先后将他的书稿命名为《归来》、《香山红叶》、《一代天骄》、《氢弹之母》等。小说中对周恩来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歌颂，对丁洁琼、苏冠兰等热爱祖国、坚持正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张目，得到了人民的赞誉。当然，这必

然要触犯“四人帮”的王法。这部小说当时就被判定为“流毒全国”的“反党作品”。作者铛银入狱，被拘押了四年之久，才获得释放。这些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已经具备后来新时期小说的某些值得肯定的特质：忠于生活的真实，对社会弊端所持的批判态度，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它们，在披荆斩棘中艰苦地开辟着道路……

应该看到，这历史的泥泞并不仅仅是在浩劫的十年中才具有的。它的形成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学的发展虽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却几经坎坷、屡受挫折。在蜿蜒行进、沉浮不定的轨迹中，凝聚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从一九五一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当代文坛就表现出文艺指导思想及创作实践方面的严重偏颇。对文学功能、作用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简单化认识，对文艺领域中思想斗争的扩大化趋势，都极大地干扰、扭曲了文学的健康发展。一九五一年六月，文艺界开始批判肖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小说写的是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由于工作的需要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刚刚解放的北京。思想感情上的某种距离造成他们对周围事物看法上的差异。一个欲以坚决的革命态度与城市的污秽进行斗争，而又略显偏激、狭隘；一个面对城市安逸生活的诱惑松懈了精神上的防线，但也能时时检讨、自省。作品提出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既适应环境又改造环境，保持无产阶级本色的问题，是及时的、令人警醒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而当时却被认为是“歪曲和丑化了革命干部”，是“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两年后，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也遭到批判。一个赴朝志愿军战士和当地的朝鲜姑娘的纯洁而动人的爱情纠葛，也被简单

化地说成是“歪曲了英雄战士和人民的形象”，“对革命纪律有血有肉的控诉”等。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和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不仅给这些作家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坎坷命运，而且也挫伤了不少作家的创作积极性。这样的批判虽然在建国初期尚未完全成为支配性的倾向，但却给当代小说从一开端就笼罩上一层阴影，表明初生的新文学已留有某种“左”的胎记。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是当代小说有所突破、有所开拓的关键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潮流——人们已习惯称之为“干预生活”的文学潮流，以前所未有的新颖姿态奔腾于文学的滔滔长河之中。批判社会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和思想僵化，描摹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复杂的爱情生活情态是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一批优秀的作品脱颖而出。它们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然而好景不长。稍后出现的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将初步形成的大好局面一扫而尽。这标志着“左”的思潮已经在我国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占据了统治的地位。一批有才华、有作为、勇于探索的作家受到了不公正的政治待遇，造成他们在后来近二十年中的不幸命运。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都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象这样敢于揭露矛盾，批评时弊的小说创作几乎是绝迹了。王蒙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回顾过去，我们并无伤感或者私人的怨恨。我们把党的挫折看作自己的挫折，我们认为医治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身上的创伤远远比抚弄我们自身上的疮疤要紧得多。我们只是希望对历史和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还以本来面目，一切经验将被记取，我们的父兄和我们这一代人付出的学费将不会白搭，我们有理由要求下一代青年作家，下

代读者和下一代中国人有比我们更好的命运。我们还要坚定地宣布，决不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重演。”（《我们的责任》）这不仅是作家个人的感情，也是人民的心愿。

在此之后，“左”的魔影一直在小说创作的领域内游荡。一九五九年文艺界对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讨论，对赵树理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的争议，后来对刘真的小说《英雄的乐章》的批判，对于逢的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讨论，对欧阳山的短篇小说《乡下奇人》、《在软席卧车上》的非议等等，都显示了“左”的干扰和破坏。即使在当时被认为是优秀的作品中，我们今天仍可以看到严重的时代局限和内容判断上的失误。一九六三年以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更是将小说创作引入歧途。一大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作品，歪曲当时的政治形势，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左”的思潮膨胀推波助澜。三年困难时期农民群众的饥饿状态，绝对平均主义所造成的“吃大锅饭”的弊端，一些蜕化变质干部的思想作风的败坏，工农业生产濒临凋敝破产的情势，党的政治路线严重偏离正确轨道……都没有在小说创作中得到应有的表现。应该说，这是文学的失职！

在小说艺术实践上，十七年时期中许多从政治出发、从路线出发的固有的创作模式束缚着作家的创造力。作家在统一的、标准的思想意识和艺术模式的制约下，没有自己独特的思考、独特的个性、独特的表现方式。总的看来，小说的艺术发展是迟缓的。再由于长期“闭关锁国”的情况，也使得小说创作艺术借鉴的视野十分狭窄。

新时期小说就是跨越了这样一片泥泞后，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大厦的建筑。猛然揭开历史帷幕后面出现了文学创作的新景象。诗歌和独幕话剧一度成为开路先锋。短篇小说也

取得了新的收获，象《人民的歌手》、《心声》、《足迹》、《从森林中来的孩子》等作品，都从思想内容上表现出拨乱反正的新意。然而，由于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仍然受着“四人帮”体系的严重影响，“左”的思潮仍然畅行无阻。文学处于苦闷的徘徊当中。获得解放的喜悦与仍受羁绊的焦虑交织成一股困惑与期待的强烈思绪。拨乱反正，扭扭怩怩。群众激愤，欲诉又休。文坛在早春的峭寒之中沉寂……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号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带着震撼人心的呼唤，带着耐人寻味的思索，《班主任》走向文坛，也走向广大读者的心中。这篇小说毫无隐晦地将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实地表现出来。作品触及了一个怵目惊心的课题：“四人帮”用最革命的“逻辑”与“口号”，掩盖其最反动的愚民政策。而这种“愚民”的毒剂，首先在坑害着千千万万的代表着祖国未来的孩子。“畸形儿”宋宝琦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他的“拒绝接受一切人类文明史上有益的知识 and 美好的艺术结晶”的无知和愚昧是显而易见的。而谢惠敏则属于另一种比较隐晦的类型。在我们过去传统的意识中，谢惠敏似乎应属于“好学生”、“正面人物”之列。然而，如果剖开事物表象来看，她的灵魂所受到的“左”的锈蚀和残害，比较宋宝琦更过之而无不及。更令人深思的是，受了这般严重的精神创伤，而至今人们（也包括谢惠敏自己）都没有认真的察觉。谢惠敏，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典型形象的塑造。这是作家独具慧眼，以拨乱反正的勇气，真实再现生活与深刻开掘生活的结果。《班主任》率先表现了我们民族灵魂中的内伤和隐患，说出了人民群众欲说未说的心里话，无疑具有先声夺人、振聋发聩、树立旗帜、突破禁区的开创

作用。尽管这篇作品在艺术上还显得粗糙，形象刻画也欠丰满，但是在当代文学史上确乎具有筚路蓝缕的标志性意义。一篇小说划出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对《班主任》的发表，广大读者“爆发出了·一种出乎作者和编者意料的热情”。刘心武本人就收到了数百封支持和祝贺的信。“谢惠敏”也成为流行于人民群众中的某种类型人物的代用词。

这是小说领域中的一朵报春花！它带来了兴奋与希望，它预示着满园春色花似锦的前景……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次会议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不仅开辟了党的政治生活的新阶段，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真正的春天。历史的泥泞被清除了。新时期文学航道上的暗礁险滩被清除了。它，从这里作为起点，扬帆启程了！而驶出的第一程就是一九七九年十月，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十年动乱之后，文艺界空前大团结的盛会，是向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文艺路线进行讨伐的大会，是展示中国文艺将要开始新的征途的誓师会。它，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新时期小说的复苏有许多有利的因素：面对极度荒芜的文苑，广大人民都焦渴地盼望着文学的重新振兴。这无疑是一股强劲的、不可抑制的历史动力；党和国家的正确的文艺路线的确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真正贯彻落实，调动了广大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有了极大的增强；十年动乱的生活也从特定的角度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素材：国家的灾难、家庭的悲剧、个人的不幸，有多少催人泪下的故事，有多少令人愤慨的冤案，有多少难以倾诉的情感……这正是人民需要文学，文学需要人

民、二者“相依为命”的时代。

新时期小说就这样艰难地而又是欣喜地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II、从“伤痕”到“反思”的激进姿态

与轰动效应

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狄德罗说过这样一段话：“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象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亲身经历的人所不认识的事物……而在那样的时候，情感在胸怀堆积酝酿，凡是具有喉舌的人都感到说话的需要，吐之而后快”。（《戏剧艺术》）这段话道出了古今中外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新时期小说的崛起也不例外。

继刘心武的《班主任》之后，人们向往的作品象井喷一般涌现出来了……

最早引起人们心灵震撼的是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这篇作品以诚挚的口吻叙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中无情的批判运动损害了一对母女的正常的血肉关系。直到真相大白，女儿从迷误中清醒过来，然而母亲的去世，已经不能让女儿再当面倾诉忏悔和怀念的情感……就是这样一篇尚显稚嫩的大学生习作，引起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响。不少人热泪盈眶地捧读、辗转借阅、奔走相告……发表这篇作品的《文汇报》编辑部收到了近九百件读者来信。这耐人寻味的故事唤起了千千万万人对那可怕年月的回顾和联想。一场大劫难，哪一个正直的人没有一段辛酸、难忘的遭遇。这条无形的伤痕，深深地刻划在人们心灵的深处。难以弥合的伤痕！值得猛省的伤痕！越抚慰越疼痛的伤痕！卢新华的小说，第一个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人们精